

# 上帝為體，西學為用

## ——晚清傳教士李提摩太傳播西學的 挑戰與回應

郭至汶\*

在西學東漸的晚清，中國知識分子面臨轉型的課題。與此同時，在中國傳播西學的傳教士也面臨了同樣的議題，知識傳播者與接受者同在變動時代中經歷轉型的試驗。過去學者多將研究重點放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探討他們面對西學的回應。本論文則藉由新材料的發現，梳理一名以傳播西學聞名的傳教士——李提摩太的轉變歷程，對晚清西學東漸的課題進行研究。本論文耙梳現藏於英國牛津大學攝政公園學院(Regent's Park College)的安格斯圖書及檔案館(The Angus Library and Archive)所收藏英國浸信會與所屬傳教士往來的信件，以李提摩太在中國傳教的歷程為論述主線，探討其平衡西學與基督教的轉型過程。他所提出的神學觀點：「上帝為體、西學為用」，恰好也與晚清知識圈內所提倡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形成巧妙的對比。

關鍵詞：李提摩太、浸信會書信檔案、基督教與西學、西學東漸

---

\* 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博士候選人

## 一、前言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從 1891 年起接續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的職位擔任廣學會的負責人,<sup>1</sup>前後一共在廣學會任職 25 年,這段期間正好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轉型時代,<sup>2</sup>知識階層開始關注西學。加之以李提摩太個人著作豐富、勤於筆耕,不僅大量翻譯各種西方新知,還透過報刊大力推廣西學,這也使得他成為當時中國知識階層重要的關注對象之一。<sup>3</sup>李提摩太在中國人脈廣闊,上至在朝的政要李鴻章(1823-1901)、張之洞(1837-1909),下至在野的知識分子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等人,均與他相友好。其著作亦多元,除了傳播基督教的宗教書籍之外,還譯著許多推廣西學的書籍。<sup>4</sup>晚清出現的這股學習西方的浪潮,李提摩太不僅參與其

---

<sup>1</sup> 李提摩太,英國浸信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1870 年抵達中國開始傳教,1916 年退休回到英國,在中國傳教的時間長達 46 年之久。韋廉臣,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後加入蘇格蘭聯合長老教會(Scottish 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著有《植物學》、《格物探原》、《基督實錄》,及《北方中國、滿州與東蒙古游記》(*Journeys in North China, Manchuria, and Eastern Mongolia*)等書。關於廣學會的研究可參考王樹槐,〈清季的廣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臺北,1973),頁 193-227。

<sup>2</sup>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雙月刊,52(香港,1999.4),頁 29-39。

<sup>3</sup> 熊月之,〈李提摩太——「鬼子大人」〉,收入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466-489。

<sup>4</sup> 李提摩太的著作例如經濟學的〈生利分利之別〉、農學的〈農學新法〉、地理學的《天下五大洲各大國》、以及通俗文學的《百年一覺》等,大多廣受好評。其中他所翻譯的歷史書籍《泰西新史攬要》(*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更成為晚清中國暢銷的一本書,該書多次再版,書商大

間，更是重要的推手。

在晚清的傳教士當中，隸屬於新教的傳教士對於科學、科技等西學知識態度較為開放，許多傳教士投入了推廣西學的工作。<sup>5</sup>稍早於李提摩太，林樂知(Young J. Allen, 1836-1907)創辦的《萬國公報》以及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主編的《格致匯編》當中便連載有許多西學的內容，舉凡數學、物理、化學、農學、醫學、生物學、植物學、機械、工程、工業技術、天文學、地理學等知識均在介紹之列。<sup>6</sup>另外，1877年新教傳教士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性大會，會中亦討論到科學教育的議題。出於「教育」的理由，他們認為能幫助中國發展的科技、科學也應當在推廣之列。<sup>7</sup>因此，輔以西學的傳教工作一般來說是可以

量翻印，可見其著作在中國的影響力。

<sup>5</sup> 詳參 Benjamin A.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83-351. 事實上，若回溯歷史，新教在歐洲的興起即與近代科學的產生相互關聯，一個常被學者提起的例子是十七世紀英格蘭的清教主義(Puritanism)促進近代科學在英格蘭的發展。新教不僅對科學的態度較為開放，甚至是推進近代科學發展的動力。詳見 David C. Lindberg and Ronald L. Numbers, "Introduction," in *God and Nature: Historical Essays on the Encounter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edited by David C. Lindberg and Ronald L. Numbers, 1-18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sup>6</sup> 關於林樂知及其《萬國公報》的研究可參考 Adrian A.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3). 傅蘭雅及其《格致匯編》的研究可參考 Adrian A. Bennett,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sup>7</sup> 例如，黎力基(R. Lechler, 1824-1908)與狄考文(C. W. Mateer, 1836-1908)在大會中針對基督教與中國的教育進行報告，分別以〈關於基督新教與教育〉("On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基督新教與

接受的。屬於新教傳教士的李提摩太，後來也追隨林樂知、傅蘭雅等人的腳步，投入西學傳播的行列。

關於晚清西學傳播的研究，學界已有許多成果。這類研究多以「西學對中國的影響」的論述脈絡為主軸，探討包括李提摩太在內的傳教士所傳播的西學對中國社會、思想的影響。<sup>8</sup>研究視角關注傳

---

教育的關係〉(“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為題發表文章，提到以基督教為主、西學為輔的知識傳遞方式是合宜的，詳見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160-180. 1890 年新教傳教士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性大會時也提出類似的看法，例如李承恩(N. J. Plumb, 1843-1899)發表〈教會學校的歷史與現況、及所需的計畫〉(“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Mission Schools and What further Plans are Desirable”)討論教會未來在中國設立的學校，便包含「工業與工藝訓練學校」(industrial and manual training schools)的規劃。面對西學，李承恩仍然是抱持基督教為主、西學為輔的基調，也可見一般的新教傳教士並不排斥西學，詳見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447-456.

<sup>8</sup> 相關的研究例如 Hao Chang, “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8,”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1: Late Ch'ing, 1800-1911*,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274-3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探討了包括李提摩太在內的傳教士翻譯著作對晚清知識界、思想界的影響。後來的熊月之、葛兆光、潘光哲也採用類似的研究視角，將傳教士的著作放在「西學對中國的影響」的脈絡中討論，著重其譯介的西學對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見熊月之，〈李提摩太——「鬼子大人」〉，頁 466-489；葛兆光，〈西洋新知的進入——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世界的變遷〉，收入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七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頁 393-420；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16：3(臺北，2005.9)，頁 137-170。

教士對中國的影響，討論中國在外力影響下的變化，這是以中國脈絡為主要的研究視角，聚焦於傳教士所推廣的西學對晚清社會所造成的衝擊。<sup>9</sup>關於晚清西學重要推手的李提摩太，學界亦有許多成果問世。<sup>10</sup>在以中國脈絡為主的論述中，做為西學傳播者的李提摩太是一

<sup>9</sup> 柯文 (Paul A. Cohen) 多年前曾提出「中國中心觀 (China-centered approach)」，批評「衝擊—回應模式 (impact-response model)」將中國視為被動、停滯的社會，認為即使有外力的衝擊，仍應將焦點放置於中國內在的脈絡當中討論較為合適。詳見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149-198.

<sup>10</sup> 例如，探討李提摩太的神學思想，瑞塔·強森 (Rita Therese Johnson) 的博士論文：Rita Therese Johnson, "Timothy Richard's The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to the Non-Christian World," (Ph.D. Dissertation, St. John's University, 1966); 安德魯·凱薩 (Andrew Terry Kaiser) 也以神學思想為主題撰寫博士論文：Andrew Terry Kaiser, "Encountering China: The Evolution of Timothy Richard's Missionary Thought (1870-1891),"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015). 關於李提摩太的教育事業，尤妮斯·強森 (Eunice V. Johnson) 的博士論文：Eunice V. Johnson,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1880-1910—Timothy Richard and His Vi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2001)，該書後來經改寫再以《李提摩太的願景——中國的教育與改革，1880-1910》(Eunice V. Johnson, *Timothy Richard's Vision—Educ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 1880-1910* [Eugene,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4]) 出版。針對李提摩太影響晚清社會甚鉅的《泰西新史攬要》也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例如鄒振環，〈李提摩太與《泰西新史攬要》——「世紀史」的新內容與新形式〉，收入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1815至1900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269-307；劉雅軍，〈李提摩太與《泰西新史攬要》的譯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7：6(石家莊，2004.11)，頁119-124等。關於李提摩太對於各大宗教(特別是佛教)的轉譯與介紹，例如 Peter Tze Ming Ng, "Timothy Richard: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s Other Religions and Cultures,"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14:1 (2008): 73-92; Lai Pan-chiu, "Timothy Richard's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位將西方學問轉移、轉化、介紹到中國的中介者，其形象相對單一。然而，傳教士本身同樣參與在西學東漸的大浪潮中，其生命歷程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產生變化。<sup>11</sup>是故，本研究將從李提摩太的個人經歷出發，探討其傳播西學所經歷的挑戰與回應。

## 二、傳教與傳播西學

1870 年李提摩太抵達中國，開始他的傳教生涯。早年李提摩太的傳教方式與其浸信會(Baptists)同事相仿，採取的是向大眾傳遞福音的路線，主要對象並非中國的官員，而是一般的百姓。<sup>12</sup>他早期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也與其所選擇的路線相呼應，1874 年起在《萬國公報》上連載的〈救世當然之理〉便是一系列介紹基督教的文章。<sup>13</sup>這一系列

---

29 (2009): 23-38 等。然而，上述研究並未觸及李提摩太推廣西學時所遭遇的挑戰這一課題。

<sup>11</sup> 事實上，傳教士在中國的處境之下會改變他們的思想與做法，這樣的觀點過去已有學者提出。例如，連曦(Lian Xi)在《傳教士的轉型——中國的美國基督教自由主義，1907-1932》(*The Conversion of Missionaries: 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07-1932*)一書中便討論美國傳教士在民國初年配合中國的環境所進行的調整。詳見 Lian Xi, "Grafting Christianity onto a Nationalist China," in Lian Xi, *The Conversion of Missionaries: 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07-1932*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7), 151-169.

<sup>12</sup> 早年李提摩太的重心是向大眾傳遞福音，這點可從他在《萬國公報》上刊登的有獎徵文得到印證。例如李提摩太，〈英國浸會教士李提摩太謹啟〉(《萬國公報》，1875 年 12 月 4 日，頁 24)、〈李提摩太先生出題囑作詩句取中備有酬金告白〉(《萬國公報》，1876 年 9 月 2 日，頁 30)提到希望能徵得適合的篇章使得「聽者雖愚夫愚婦，亦能了然於心」、「賢愚同口稱讚」，可見早期李提摩太主要的傳道對象並非中國官員，而是平民百姓。

<sup>13</sup> 這一系列的文章，從對上帝的介紹開始，介紹信奉上帝的益處，及如何能

文章所呈現的內容仍屬於典型的基督教教義宣傳，顯見早期的李提摩太仍在傳統基督教的思想範圍內，尚未涉及有關西學的範疇。根據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的報導，<sup>14</sup>1876年開始的山東、山西旱災是他傳教工作的轉捩點。<sup>15</sup>旱災發生的那幾年，李提摩太親身參與救災，在思考這些災難起源的同時，也思考著如何才是真正能解救中國的方法。他後來決定在中國推廣西學，並將傳教重心轉往中國官員，目的就是希望能解除當時北方中國的苦難。

根據《親歷晚清四十五年》的記載，1880年起李提摩太開始添購科學書籍與儀器，以此向中國官員介紹西方的科學與科技。其所添購的科學書籍包含：天文學、電學、化學、地理學、自然史、工程學、機械學、醫藥學、及各類產業學等；所添購的儀器包括：望遠鏡、顯微鏡、分光鏡、手動發電機、各種化學電池、化學電流表、蓋斯勒管、電壓表、電流表、袖珍六分儀、小型無液晴雨表等。他還安排對中國官員進行演講，演講的題目包括：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的天文奇蹟、化學的奇蹟、機械的奇蹟、蒸汽的奇蹟、電的奇蹟、光的奇蹟、醫藥學和外科學的奇蹟等。<sup>16</sup>中國官員對李提摩太所介紹的西方科學與科技非常感興趣，他的演講也受到中國官員歡迎。順著中國

---

領受上帝的恩澤。李提摩太，〈救世當然之理〉，《萬國公報》，1874年9月5日，頁25-28。

<sup>14</sup> 李提摩太於晚年所出版的回憶錄見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Publishers, 1916). 該書有中文譯本：李提摩太著，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本文採用《親歷晚清四十五年》進行論述。

<sup>15</sup> 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頁136。

<sup>16</sup> 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頁137-138。

知識階層對科學與科技的熱情，李提摩太開始融入西學進行傳教。

1881年起，李提摩太在《萬國公報》連載〈近事要務〉是其介紹西學的首度嘗試，<sup>17</sup>文章一共10篇，共有98條目，其所介紹的科學包含：天文、地理、醫學、生物學、植物學、化學、電學等，所介紹的科技包含：飛行器、火輪、水輪、電報、千里鏡、採礦、鐵路、機械等內容。這些內容與他當時對中國官員所進行演講的內容高度地重疊，可見李提摩太一方面以實際的行動向中國官員們展示西方的科學與科技，另一方面也在報刊上鋪陳自己的論述，使兩者相輔相成、相互呼應。除了西學知識之外，〈近事要務〉也包含許多推廣基督教的内容，例如「尊上帝以重大本」、「畏天主以救靈魂」、「法救主以得永福」、「廣廟堂以事上帝」等。在這一系列的文章當中，他將西學與基督教知識一併介紹給中國讀者。〈近事要務〉推出之後很快就得到了迴響，這一系列的文章後來還集結成書，單獨以專書《近事要務》的方式出版。<sup>18</sup>

傳教士傳播西學，或許在晚清中國知識分子眼中並沒有違和之處，畢竟晚明東來的天主教已有前例，但對李提摩太來說並非如此。

<sup>17</sup> 李提摩太在《萬國公報》上發表〈近事要務〉時並沒有使用本名，而是採用筆名「中西友」。發表〈近事要務〉的同時，李提摩太同步連載另一系列基督教宣傳文章〈郭丹宣道記〉，但在〈郭丹宣道記〉使用的是本名，卻在〈近事要務〉使用筆名。其原因可能是〈近事要務〉涉及西方科學與科技的介紹，由於它們不屬於傳遞福音的範疇，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因此李提摩太便以筆名來發表〈近事要務〉這一系列的文章。李提摩太，〈近事要務序〉，《萬國公報》，1881年11月12日，頁2-3；〈郭丹宣道記〉，《萬國公報》，1881年11月19日，頁7-9。

<sup>18</sup> 《近事要務》為李提摩太個人獨立出版的專著，內頁註明「光緒八年歲次壬午新刊」、「英國教士李提摩太著」等字句。李提摩太，《近事要務》（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及檔案館[The Angus Library and Archive, University of Oxford]館藏，光緒八年鉛印本）。



李提摩太在晚清傳播西學所面臨的可能挑戰至少來自兩方面。首先，是以慈禧太后(1835-1908)及保守親貴集團為代表的勢力所展現的不友善態度。<sup>19</sup>這部分對李提摩太來說影響較小，原因在於保守派集團主要提防的對象是以李鴻章、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集團，而李提摩太所扮演的角色是洋務派的顧問，是處在較為邊緣的位置，來自保守派的打擊力道不會直接影響到他。<sup>20</sup>其次，是來自基督教內部保守勢力的挑戰。雖然一般的新教傳教士並不反對輔以西學進行傳教，但部分保守勢力仍認為李提摩太傳播西學已經超出了傳教的範圍，故他們嚴厲地批判這種傳教方式。關於這部分學者較少觸及，但這卻直接影響到李提摩太後來的神學觀點與傳教方法。對保守派的基督徒而言，西學與基督教屬於兩種不同的範疇，兩者涇渭分明，不應混為一談。當思想開明的李提摩太決定將科學與科技融入傳教工作時，便埋下了將來引起基督教內部保守勢力反彈的因子。是故，李提摩太在向中國知識階層介紹西學的同時，也必須處理來自教內保守勢力的反彈聲浪。如何在西學與基督教之間取得平衡，便成為其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李提摩太在晚年的回憶錄當中提到，自然規律來自上帝的創造，科學的發展來自自然規律的掌握，科技的演進來自科學的應用，而科

<sup>19</sup> 自洋務派的代表之一恭親王奕訢(1833-1898)奉旨設立同文館招收生徒肄習西學起，在晚清的政治格局中保守派與洋務派便一直處於緊張的關係。詳見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頁 90-94。

<sup>20</sup>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當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清政府下令取締鼓吹變法的知識分子，限制相關言論的出版，但李提摩太的言論並不在取締之列，他仍舊可以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另一個例子是，曾對洋務運動有所批評的翁同龢曾幾次接見李提摩太，於其日記中稱他「豪傑也，說客也」、「讀書明理人也」，主要是把李提摩太當成顧問看待，並沒有把他當成政敵防範。詳見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73)，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初九日，頁 1981；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廿七日，頁 1990。

技的運用則是解救中國苦難的重要工具。<sup>21</sup>在此一認知圖景中，上帝、科學、科技、與解救苦難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科學、科技與宗教不僅同源，科學與科技的發展還能與宗教解救人類苦難的目標配合。很顯然的，李提摩太已將西學(科學與科技)融入了基督教的脈絡進行論述，認為西學與基督教一脈相承，彼此能相互協調，其間並沒有隔閡與衝突。但這是李提摩太晚年所持的觀點，是其以西學進行傳教的事後詮釋。事實上，若還原當時的歷史現場，當他開始透過西學進行傳教時，其實是遭遇到教會內部保守勢力的反彈。這段過往，《親歷晚清四十五年》當中並沒有多所著墨，只有在第八章第三節「來自同事們的批評」間接提及：

回到太原後，我繼續按原來的方式展開工作，發表了一本關於道教的小冊子，指出它表述的道理是真的，也表明了基督教比道教高明的地方。承認當地人的宗教有些可取之處，這在我那些年輕的同事們看來，簡直就是罪大惡極的異端邪說，我傳教的方式也被認為是絕對不可接受的。……為此，他們給浸禮會委員會寫了一封長信，對我的神學觀點和工作方式提出了責難。<sup>22</sup>

李提摩太認為其與同事發生衝突的原因，在於他肯定其他宗教(道教)的可取之處。然而，從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及檔案館(The Angus Library and Archive)所保存的李提摩太及其同事與英國浸信會往來的信件來看，當時他與教會內部成員發生衝突的原因並非如此。事實上，將教會的經費花在添購科學儀器，過度地倚重科學、科技進行傳教，同時將重心轉向中國官員才是李提摩太遭到教會同事嚴厲批判的主要原因。他還甚至為此離開原傳教地轉往其他城市，可見當時衝突之嚴重。底下

21 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頁 136。

22 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頁 186。

將討論李提摩太融合西學以傳教的經歷，探討他如何面對基督教內部保守勢力的挑戰。

### 三、來自教內的挑戰

1885 年李提摩太回英國休假，隔年返回中國，其間英國浸信會派遣其他傳教士代替他的工作。《親歷晚清四十五年》當中提到 1886-1887 年李提摩太面臨了極大的挑戰，同屬山西浸信會的同事對其「神學觀點」與「傳教方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些批評甚至寫成了數封信回報至英國的浸信會委員會，舉報其在中國的傳教方法，可見對李提摩太相當不以為然。<sup>23</sup>李提摩太的同事對於過度以科學、科技進行傳教的方式無法認同，雙方也因此產生矛盾。

從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所藏信件檔案來看，當時寫信批評李提摩太的至少有兩位傳教士：狄克松(Herbert Dixon, 1856-1900)以及德治安(Joshua Turner, 1854-1937)。狄克松與李提摩太同屬英國浸信會派駐至山西的傳教士，德治安則為曾參與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後加入浸信會派駐至山西的傳教士。現存的信件檔案，狄克松前後一共寫了 5 封信回英國，分別寫於 1887 年 3 月 18 日、4 月 25 日、5 月 13 日、10 月 14 日，以及 1888 年 11 月 13 日。<sup>24</sup>德治安也寫了 5 封信回英國，分別寫於 1887 年 2 月某日，1888 年 1 月 15 日、5 月 23 日，5 月某日，以及 12 月 28 日。<sup>25</sup>

<sup>23</sup> 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頁 185。

<sup>24</sup> Correspondence, written by Herbert Dixon, 18 March 1887, 25 April 1887, 13 May 1887, 14 October 1887, 13 November 1888, no. CH/1, The Angus Library and Archive, Regent's Park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sup>25</sup> Correspondence, written by Joshua Turner, February 1887, 15 January 1888, 23 May 1888, May 1888, 28 December 1888, no. CH/65, The Angus Library and

狄克松於 1885 年才被派至山西太原，係為李提摩太在《親歷晚清四十五年》當中所提到的「年輕的同事」。他在寫給英國浸信會的信中對李提摩太的傳教方式進行了批判，其中一封信提到：

有一件事可能會震驚委員會，亦即我們對傳教工作的信念與李提摩太的傳教計畫相悖反。我們幾乎是全體一致地譴責他的計畫，這個計畫已在香港試驗過，而且是絕對錯誤與失敗的。在很多情況下，李提摩太的傳教立場、和官方的關係、及其傳教工作皆給人留下非常容易誤導的印象……。他與官員互動時並未向他們傳遞福音，原因是官員並不理會，但他卻利用展示西方科學益處的機會而得以見到某些官員，讓他們為此留下印象。五年來，他都用這種方法提供官員想聽的諸如採礦、燃煤等資訊，並為他們做評估。在其他有用處的事物中，他也做一些翻譯工作，並且花了兩年時間及許多資金在教師身上，讓他們撰寫中國音樂史。除了翻譯工作之外，上述的工作根本不是傳教工作。買四、五台昂貴的機器可以用來發電、以及花上百鎊買車床，但這些都沒有用處，只是放著生鏽；又或是買印刷機，我想是花了四十鎊吧，但這些都不適於傳教所需的工作。李提摩太不切實際的性格對我來說，都顯示他相當不適合做為一個教團的領導……。我十分同意德治安的說法，即採用西方科學來接近官員的作法會喪失原本對民眾傳遞福音所能帶來的好處。<sup>26</sup>

狄克松認為展示西方科學的益處並不是傳教工作，也不應當把傳教重心放在中國官員身上。他指出，李提摩太向中國官員介紹科學必須購

---

Archive, Regent's Park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sup>26</sup> Correspondence, Herbert Dixon to Vincent Tymms, 18 March 1887, no. CH/1, The Angus Library and Archive, Regent's Park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買許多科學儀器，此舉花錢又無效，中國官員在聽完科學新知之後，並不會接受基督教。同時，把重心放到中國官員上無形間也壓縮了對平民百姓傳教的機會；相較於官員，向百姓傳教能獲得的成功機率明顯高出許多。從信中所傳達的觀點來看，狄克松的傳教重心仍然在平民百姓，而非官員、知識菁英，且在傳教方式上，仍偏好傳統傳遞福音的路線。李提摩太採用介紹科技與科學的方式對知識階層傳教，這對狄克松來說是無法接受的。

除了狄克松之外，另一位服務於山西的傳教士德治安也寫信給英國浸信會批評李提摩太的傳教方式。德治安與李提摩太為舊識，兩人曾在賑災工作上有過幾次的合作。德治安於 1875 年起服務於中國內地會，該會以深入內地傳遞福音為主要目標。<sup>27</sup>德治安後來於 1881 年加入浸信會，成為李提摩太的同事。也因為德治安所接受的是中國內地會較保守的傳教理念，因此對於採用西學推廣基督教、並將重心轉移至中國知識階層的傳教方式無法認同。在現存德治安的五封信中，有兩封信批判了李提摩太的傳教方式。第一封寫於 1888 年 1 月 15 日，收信人為英國浸信會的秘書長貝恩斯(Alfred Henry Baynes, 1838-1914)，信中提到：

就我個人來說，我十分期待這個事件能夠平息，或等待進一步的調查。但我敢肯定的說，如果李提摩太回到這個城市、並實踐他的計畫，整個教派都會為此感到憤怒。無論委員會是否樂

---

<sup>27</sup> 中國內地會的創辦人為戴德生(Hudson Taylor, 1832-1905)，其與李提摩太在傳教方法上的異同可參考 Paul A. Cohen, "Missionary Approaches: Hudson Taylor and Timothy Richard," *Papers on China* 11 (December 1957): 29-62. 關於中國內地會的介紹，可參考 Jost Oliver Zetzsc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2: 1800-Present, edited by Gary Tiedemann, 177 (Leiden, Boston: Brill Publishers, 2010).

見，他們都應當記得李提摩太、還有那些已被花掉的來自浸信會上千鎊的收入……。我們盡了應盡的職責，而且我誠摯地希望李提摩太離開這個省分，讓我們不必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但持平而論，如果李提摩太的教法及計畫被委員會授權在這個國家的任何一個地方施行，並且在母教會中有所討論，我將有義務採取行動。這不是出於個人好惡對抗某個人，而是因為我相信基督徒不應在看到傳教經費被花在支持這些教法及計畫時袖手旁觀、不做任何努力，或者，至少也應當告知捐款者他們的錢是怎樣被花掉的。<sup>28</sup>

李提摩太與其同事的差異，一方面是路線之爭，另一方面則是對經費使用見解的不一致。李提摩太將來自英國浸信會的經費用於添購科學儀器、書籍，並且將傳教重心轉向中國官員，這顯然與山西浸信會長期以來向大眾傳遞福音的路線相違背。因此，德治安對此嚴厲批判，並向英國浸信會舉發他濫用資金，以嚇阻其不當的傳教行為。這對李提摩太造成極大的壓力，同時也可見母教會的經費對外地傳教士的重要性。<sup>29</sup>

李提摩太於 1887 年 10 月離開山西、前往天津，而後在同年 11 月

<sup>28</sup> Correspondence, Joshua Turner to Alfred Henry Baynes, 15 January 1888, no. CH/65, The Angus Library and Archive, Regent's Park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sup>29</sup> 另一個例子也可見母教會經費的重要性。1898 年李提摩太致函包括其母教會在內的英、美教會，希望他們能支持廣學會的出版、文化傳播工作。即使廣學會出版的書籍、報刊在市場上反應甚佳，有銷售上的獲利，但李提摩太仍需要教會給予經費上的支持，以幫助廣學會進行工作推廣。詳見 Timothy Richard, "Appeal to Missionary Societies to Help in Literary Work (Shanghai, August 1898)," in Timothy Richard,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Vol. II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07), 96-100.

抵達北京，1888 年寓居於北京。1888 年 1 月李提摩太雖已離開了山西，但他在山西的同事德治安仍寫信回英國浸信會，希望李提摩太不要再回到山西，並認為他的離開對於當地的教團來說是好事，倘若仍回到山西推動西學，山西當地教團會繼續爭執不休。德治安同時希望英國的母教會不要為李提摩太的傳教方式背書，也不要對其有任何資金援助，以杜絕這種異端式的傳教方式。顯然，李提摩太的離開並沒有因此平息同事對他的批判，即使已經離開山西，他的同事仍然持續批評李提摩太的傳教方式。

狄克松認為李提摩太必須接受教會的規範，停止推動中的計畫；德治安認為李提摩太應該要離開山西，並停止推動西學。為免衝突，李提摩太於 1887 年年底已先離開山西，因此就有一種傳言說他已經脫離了浸信會。為了破除這樣的傳言，1888 年初李提摩太還為此寫了一封公開信登至《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澄清：<sup>30</sup>

敬啟者：我注意到上一期的《教務雜誌》中，您提及我已離開浸信會，這是不正確的。我仍和浸信會保持聯繫，我們浸信會的山東分會已解決了最近的分歧，亦即「李提摩太一旦認為可行，他將在基督教的規範下於濟南府(山東省會)成立協會，其目標是提供機會使知識階層與管理階層於協會中學習適合當前需要的學科，使用目前最好的基督教書籍，教授普通科學，如果有需要的話也學習英文……。」歡迎您使用以

30 《教務雜誌》是由新教傳教士所創辦的英文刊物，主要的讀者為在中國傳教的傳教士。關於《教務雜誌》的介紹可參考陶飛亞，〈傳教運動的圈內「聲音」——*The Chinese Recorder*(1876-1941)初論〉，收入張先清編，《史料與視界——中文文獻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243-262。

上所述的資訊。<sup>31</sup>

公開信中強調他沒有離開浸信會，仍在持續參與浸信會的工作，浸信會山東分會的邀請可做為證明。不僅如此，浸信會山東分會還認同李提摩太的傳教理念，願意協助向中國官員、知識階層傳教，傳教內容當然也包含科學、科技等西學。這封公開信算是李提摩太對其同事批評的首度公開回應，由此也可看出他不願意妥協，雖然遭受到批評，但仍認為自己的傳教方式是恰當的。然而，李提摩太必須寫公開信澄清是否離開教會，顯然其與同事理念不合的事已經傳開，甚至山西以外的傳教士也知道，可見當時雙方衝突已經檯面化。

德治安在 1888 年 1 月 15 日的這封信雖表明他對李提摩太傳教方式的不以為然，信中並沒有針對其所做的具體事件進行批判。但或許是看到了李提摩太在《教務雜誌》發表的公開信，看到他仍然堅持己見，仍舊要到另一個地方(山東)繼續推行西學傳教的理念，這使得德治安決定增強批判的力道，再次寫信回英國對李提摩太進行批判。

這封信寫於 1888 年 5 月，有所不同的是，該信德治安並非寫給英國浸信會的秘書長貝恩斯，而是拉高層級寫信至英國倫敦浸信會委員會(The Committe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批評李提摩太的傳教路線。該信長達 26 頁，指控李提摩太偏以科學、科技傳教的方式對傳教士所應履行的傳福音任務有害，英國浸信會應當要禁止這樣的傳教行為。<sup>32</sup>《親歷晚清四十五年》當中提到「他們給浸禮會委員會寫了一封長信，對我的神學觀點和工作方式提出了責難」的那封

<sup>31</sup> Timothy Richard, "From Rev. Timothy Richard," *The Chinese Recorder* 19:4 (April 1888): 180.

<sup>32</sup> Correspondence, Joshua Turner to the Committe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May 1888, no. CH/65, The Angus Library and Archive, Regent's Park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信，<sup>33</sup>指的便是德治安寄給英國浸信會委員會的這封信。該信傳送至委員會後，很快地就被製作了幾份複印本，一份送至貝恩斯，另一份送至李提摩太手上。在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所收藏的資料當中，便有這封信的副本。該信可視為李提摩太採取西學傳教路線以來所遭受到最嚴厲的批評。

這封信大量舉出各種例證批評李提摩太的西學傳教路線，其中大部分的例證是出自《近事要務》。<sup>34</sup>從這件事情後來的發展來看，當初李提摩太使用筆名「中西友」在《萬國公報》上連載《近事要務》的內容，可能就是考慮到這些文字具有某些爭議性，並不適合以傳教士的名義發表，因此才採用筆名。<sup>35</sup>可惜事與願違，《近事要務》中的文章還是被當成指控的證據，最後成為了德治安所批判的對象。

德治安在這封信中針對多種李提摩太所推廣的科學與技術進行批評，例如化學食物、測風向的氣球、電力、以及飛行器等。<sup>36</sup>在此試舉其中一項科技「飛行器」為例說明：

目前我並沒有把有問題的手冊寄回去，但對於這麼做的教會成員來說，通知您李提摩太於過去十年致力於製造飛行器、並做了許多不同的飛行器模型，這是相當應該做的事。目前在這個城市有許多倉庫，其中兩個是 1887 年李提摩太離開太原府前

<sup>33</sup> 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頁 186。

<sup>34</sup> 該信引用《近事要務》的第六、七、八、九、十二、十六、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九、六十四、六十六、七十、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六、八十一、八十二、九十四、九十八等章。Correspondence, Joshua Turner to the Committe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May 1888.

<sup>35</sup> 李提摩太，〈近事要務序〉，《萬國公報》，1881 年 11 月 12 日，頁 2-3。

<sup>36</sup> 該內容引用《近事要務》的〈創化食以養餘丁〉、〈制氣球以驗風道〉、〈究電學以知未能〉、〈重獎賞以勵空行〉等章。Correspondence, Joshua Turner to the Committe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May 1888.

所設立的。我發現任何人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在餘暇的晚上製造飛行器，這或許是個秘密行動。然而，李提摩太的手冊中提到他將提供一萬兩給能夠發明飛行器的中國人，顯然這不是個秘密。這本手冊是由身為傳教士的李提摩太所發行的，並且在各大教會中廣泛地流通。<sup>37</sup>

由此，德治安認為李提摩太推廣「飛行器」對傳教工作所產生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

我和法爾定(George B. Farthing, 1859-1900)打算拜訪胡先生，一位青州教會的成員，最近在市場中靠近他家的位置設了佈道所。這個佈道所的牆上張貼了手冊，但最吸引人的是有關飛行器的內容。我要求胡先生將它撤下來，並將在這封信中揭露此事。我私下勸胡先生，建議他不要把這些東西貼在牆上。他看起來非常驚訝，並且說道：「我張貼這些內容是向民眾展示上帝的神力，如果他們能成為上帝的信仰者，就可以藉由上帝的力量幫助他們製造飛行器。」我認為這個想法對傳教工作是有害的，而這個觀點至少得到太原府中十四分之一信徒的認同，他們參與教會只因為他們希望藉由發現一些「神奇的西方發明來賺取金錢」。<sup>38</sup>

德治安認為李提摩太以飛行器來展現上帝的神力，這種借助科學、科技來傳教的方式顯然誤導了中國信徒對上帝的信仰，對傳教工作來說是個巨大的傷害。根據信中的描述，李提摩太曾投入資金研發飛行器，並鼓吹中國官員也投入資金鼓勵人們進行研發，《近事要務》第八十

---

<sup>37</sup> Correspondence, Joshua Turner to the Committe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May 1888.

<sup>38</sup> Correspondence, Joshua Turner to the Committe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May 1888.

二章〈重獎賞以勵空行〉可做為證據。<sup>39</sup>獎勵發明飛行器這個舉動看在德治安眼裡不僅荒誕不經、對傳遞福音沒有幫助，而且還浪費教會的資源，誤導基督教的宗旨。這種以科學、科技取代基督教傳福音的方式是他無法接受的。德治安希望浸信會委員會不要再資助李提摩太任何費用，以停止其傳布與基督教福音無關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德治安還認為李提摩太「正在以其他事物取代福音」，而所謂的「其它事物」就是暗指科學、科技等西學：

關於個人感受的轉變，我必須坦承經過這次不愉快的事件，雙方都有很多個人情緒夾雜其中，我想李提摩太相較於我們應更是如此。但當論辯像我們所討論的這種重要事情時，會激起個人的情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保證這次的論辯並不是因為個人感受而起。這是出自於堅定的信念，我認為李提摩太最終並非在完成浸信會的目標，而是正在以其它事物取代耶穌的福音。本省中的英格蘭及美國傳教士(尚未讀過李提摩太著作的摩根[Morgan]可能是個例外)心中也同樣如此認定。如果這個論辯已經逐漸為人所知，這並不是出於我個人的情緒反對李提摩太才如此，而是因為基於傳教士的職責所在，使浸信會的摯友們一同抗議資金的濫用。<sup>40</sup>

身為來到中國傳教的傳教士，傳遞上帝的福音是最重要的目的，也是至高的行為準則。德治安認為李提摩太沒有在傳福音，反而是在傳遞教外(科學與科技)的知識，這等於是從根本上否定了李提摩太做為傳教士的身分。德治安認為李提摩太正以其他事物取代福音，這無疑是相當大的指控。

<sup>39</sup> 李提摩太，〈重獎賞以勵空行〉，《近事要務》，頁 26-27。

<sup>40</sup> Correspondence, Joshua Turner to the Committe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May 1888.

德治安在信中大量翻譯《近事要務》所提到的科學、科技等西學知識做為證據，批判李提摩太以西學「取代」基督教的傳教行為，他在信中的結尾說道：

這些會引起家鄉基督徒的熱切關注，也會讓我們在英格蘭的兄弟姐妹們產生高貴的自我懷疑，認為他們或許能給傳道任務一些偉大的理由。這件事讓人擔憂，讓人憤慨他們努力賺來的錢財於過去十年用於如這些手冊所述的內容。這是對的嗎？該讓這事繼續下去嗎？當提及這些事，我們會被指責是出於個人感受，也會被告知那是善行義舉，是我們不明究理。不必多說，去詢問便是。請自己讀那些著作。我不會要求你們要接受我的翻譯、或是我的意見。讓最好的中國學者來將它們做成好的翻譯，並讓所有我們浸信會的教眾平靜並且公正地思考，我對於結果並不擔心。<sup>41</sup>

德治安將他所掌握到的有關李提摩太背離基督教義的證據上呈至英國浸信會委員會，希望由所有的委員進行評判，以確保傳教工作能在正軌上運行。由此也可以看出基督教與西學的接軌並非易事，科學、科技與宗教還是有其各自獨立的屬性。保守的傳教士，例如德治安，對於這種倚重西學以傳教的方式是無法接受的。然而，李提摩太的想法並非如此，他不僅認為西學與基督教不相衝突，甚至認為推廣西學也是基督徒該做的事。這些觀點，都在他接下來回應德治安的信中展現出來。

---

<sup>41</sup> Correspondence, Joshua Turner to the Committe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May 1888.

## 四、回應挑戰

收到德治安的批評信之後，英國浸信會便要求李提摩太提出回應，因此，李提摩太也寫信回英國為自己辯護。該信長達 32 頁，寫信的時間是 1888 年 10 月 17 日，回信的對象是英國浸信會委員會，信中則回應德治安在前一封信中所提的每一項批評。

由於德治安批評李提摩太「正在以其它事物取代耶穌的福音」，這等於是從根本上否定了李提摩太的傳教工作，認為他並不適任傳教士這個身分。面對這樣的指控，李提摩太回應的方式是將論述的高度提高至基督教的至高依歸——《聖經》，以此來說明使用科學、科技等西學知識不僅與基督教宗旨不相違背，兩者還彼此相關。他在回信中說道：

這似乎是我們之間的一個大問題，其與傳教士所涉及的工作範圍相關。請您容許我完整地說明我的立場，我將引用《聖經》的內文，並且參考古代與現代傳教工作的實際案例，以及家鄉牧師與基督徒們的實際案例。下面所徵引的一些段落表示天上的父對我們當前在物質上的困頓並非莫不關心。舉幾個關於彌賽亞的預言為例——《詩篇》72：2-4、12-14，《以賽亞書》41：17-20、61：1-2。「他要按公義審判你的民，按公平審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義使民得享平安。他必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窮乏之輩，壓碎那欺壓人的。」「因為窮乏人呼求的時候，他要搭救，沒有人幫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憐恤貧寒和窮乏的人，拯救窮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贖他們脫離欺壓和強暴。他們的血在他眼中看為寶貴。」「困苦窮乏人尋求水卻沒有，他們因口渴、舌頭乾燥。我耶和華必

應允他們……。我要在淨光的高處開江河，在谷中開泉源……。我要在曠野種上香柏樹……。」[注意：福音時期便提及物質享受的恩典]其次，「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如果我們只是將這些段落視為精神上的，我們是否限制了《福音書》的範圍，剝奪了基督大部分的榮耀？]向上帝祈禱時我們說：「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哪裡會不重視其子民在物質、智識及社會上的安適感呢？<sup>42</sup>

李提摩太認為《聖經》已有記載，為了解除人類的苦難，上帝賜予人類諸如「水」、「香柏樹」、「膏」等物質方面的需求以改善人們的生活，可見《聖經》不是只提及精神，也關注物質。因此，「物質」也應當是傳教士該關注的面向。將此理念推而廣之，科學、科技只是用來幫助中國改善物質生活的工具，目的是要幫助中國人民離苦得救。這樣的行為不僅與傳福音不相違背，還與上帝的本意相符合。

為了加強自己的論述，李提摩太還引用基督教歷史上的具體例證來加以說明：

其次，試想古代及現代有多少的傳教士詮釋了他們在實務上的責任。除了精神與道德上的工作，他們也在他們所愛的政治、社會、智識、甚至物質等人類福祉上用功，完整實踐了適才所徵引的《聖經》段落。可做如是觀察：政治工作上例如夏威夷群島、波里尼西亞、馬達加斯加等地。社會工作，如積極遏止

<sup>42</sup> Correspondence, Timothy Richard to the Committe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17 October 1888, no. CH/4, The Angus Library and Archive, Regent's Park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異端國度中的同類相殘、殺嬰、墮胎，以及非洲及美洲的畜奴等行為，保障婚姻中的男女平權，使中世紀歐洲市民及封建領主平權，以及使印度種性制度中人皆平權等。

智識工作。傳教士及其門生幾乎是過去一千年來歐洲唯一的智識之光，他們建立聖公會及修道院，直到後來被大學所取代。在非洲、波里尼西亞、印度、日本，甚至中國，今天都設有大量的神學院。

物質工作，例如教導熱帶地區的裸體原住民著衣，為波里尼西亞人、非洲人、美洲人、印度人造屋，為歐洲建造哥德式建築，這些至今仍為世人所稱道。本篇會在歐洲教導農業，新教徒及羅馬傳教士在非洲教導農業，世界各洲的工業，甚至大規模的商業行為，例如鄧肯於哥倫比亞所做，巴黎傳教士於巴蘇陀(Basutoe)、L.M.S 及波里尼西亞的尼列安(Neoleians)所做的事等。當前，美洲長老教會也已向中國政府面提供每年整頓黃河氾濫的治水計畫。<sup>43</sup>

強調除了精神方面的工作之外，物質方面諸如「製衣」、「農業」、「工業」等技術方面的工作同樣也是過往傳教士關心的課題。李提摩太並不否認傳福音的重要性，但同時認為科學、科技，還有其他對人類有益的政治、社會工作都應該同等重視。也因此，李提摩太認為若要能有效的解除中國的苦難，那麼傳教士就不能僅止於關注精神與思想面向，物質、政治、社會等其他面向也都要旁及。在此脈絡底下，以西學進行傳教的方式便能自圓其說：與中國官員進行交流，為的是從政治面來解決人民的苦難；發表介紹西學的言論，為的是要從社會

---

<sup>43</sup> Correspondence, Timothy Richard to the Committe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17 October 1888.

面來推廣解除苦難的方法；而推廣科學與科技，則是希望從物質面來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

在確立了傳教士的工作宗旨之後，李提摩太接著在信中針對德治安所提的每一項指控都予以反駁，全信絕大部分的內容都在反駁德治安的指控。底下試舉其為「飛行器」辯護為例：

在他的信件中第四頁徵引了本書的第一個引文，提到「獎勵空中旅行」。有一個例證可以說明提供賞金的用處，亦即有人願意在電纜完成設置前(1862)首度橫越澳洲。山西省有無數的深谷，通常有上百呎深，其地質又由黃土組成，使得鋪設鐵路有其困難。因此，德治安翻譯的空中「旅行」，我所指的是日常所需的交通。自從我撰此書後，在深壑峽谷裝設電燈的方法已在英格蘭發明出來，名為「電動纜車運輸系統」。又為了戰爭需求，幾乎所有政府每年都在保護「空中航行」上花費鉅額。為什麼不將此也用於農業及其他和平用途呢？美國知名的科學家瑟斯頓(Thurston)，一位國際科學專欄的作者，提到今年度所急需的四項新發明，其中便包括「空中航行」。但這與是否以其他事物取代福音並無關係。<sup>44</sup>

在山西推廣飛行器，著眼點是為了改善山西難以通行的交通，進而改善當地人的生活。不論根據《聖經》、或是基督教歷史上的案例都能支持改善人們的生活也是傳教士的職責，因此，李提摩太推廣「飛行器」用以來改善當地交通不便的狀況，在此脈絡下也就能自圓其說了。<sup>45</sup>

<sup>44</sup> Correspondence, Timothy Richard to the Committe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17 October 1888.

<sup>45</sup> 或許是對「飛行器」這個案例印象深刻，李提摩太晚年的回憶錄還特地把它寫進去，強調飛行器對北方中國交通的益處。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



李提摩太在《親歷晚清四十五年》當中並未提及他曾寫過這封信，但此信極為重要，是其以西學進行傳教的一個分水嶺。過往李提摩太雖也融合西學進行傳教，但並沒有將自己的傳教工作理論化。這次由於德治安的挑戰，迫使他將自己的傳教工作理論化：一方面援引《聖經》，說明自己的傳教工作具有形而上的根據，另一方面透過基督教傳教歷史上的例證，說明類似的傳教工作前人已經採用，有前例可循。差別只在於他與時俱進，採用的是當時流行於歐洲的各種近代文明新知，也因此，李提摩太為自己的傳教工作找到了形而上以及歷史上的支持。這種透過《聖經》、基督教歷史來論證西學傳教工作合理性的模式對李提摩太來說相當重要，往後幾年他使用這種論證模式發表文章，繼續推廣其西學傳教的理念。

在這封信中李提摩太還透露出一個未來會進一步引申的理念：在世間實現上帝的旨意。信中說道：

向上帝祈禱時我們說：「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哪裡會不在意其子民的物質、智識及社會福祉呢？如同他在《預言書》中所許諾的，如果有罪的我們都會給子女佳品，更何況是上帝呢？<sup>46</sup>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典出《聖經》，<sup>47</sup>表明在世間實現上帝的旨意是基督徒畢生努力的目標。為了要在此世間實現上帝的旨意，解救苦難便成了傳教士的職責。<sup>48</sup>在《親歷晚清四十五年》

十五年》，頁 132-133。

<sup>46</sup> Correspondence, Timothy Richard to the Committe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17 October 1888.

<sup>47</sup> 《馬太福音》，6：10，收入《聖經·新約全書》（香港：香港聖經公會，1981），頁 7。

<sup>48</sup> 柯文曾論及李提摩太的傳教理念「為上帝建立在世天國」，並指出李提摩太「建立上帝在世天國」的理念與其致力於現實世界的各種活動相關聯，

當中，李提摩太曾經提到他感受到上帝所賦予的任務，尤其是經歷過山東與山西的旱災，親眼見到人民所經歷的苦難，這更使他相信幫助中國人脫離苦難是上帝要他做的事。<sup>49</sup>

為了要幫助中國人脫離苦難，除了傳遞基督福音的精神面向之外，物質、政治、社會等其他面向也相當的重要，而物質、政治、社會等面向其實就是近代西方文明當中的科學、科技、與政治、社會制度。簡而言之，就是「西學」。做為一個基督徒，李提摩太不可能否認《聖經》、傳福音的重要性；《聖經》、傳福音必然會擺在傳教工作的核心。但他同時又想強調西學的重要性，也因此，就會出現一種以「上帝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傾向：近代的各種學問都可為基督教所用，它們都可以是幫助完成上帝旨意的工具。<sup>50</sup>在此脈絡底下，西學與傳教工作就不衝突，西學反而還能與傳教工作相互配合。這種以「上帝為體、西學為用」的思維模式，李提摩太在後來的文章中進行了更清楚的闡釋。

## 五、西學傳教理論的建立

李提摩太以西學進行傳教的方式在教內引起了同事的批判。1890

---

參見 Paul A. Cohen, "Missionary Approaches: Hudson Taylor and Timothy Richard," 36.

<sup>49</sup> 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頁 179。

<sup>50</sup> 傳教士若有意融合基督教和西學，「上帝為體、西學為用」是習見的論述方式，在李提摩太之前便有傳教士提出類似的看法。例如，韋廉臣於《格物探原》中介紹西學，開宗明義便說：「上帝者，以穹蒼為居所，日月星辰為明宮，地球為別館，其奧妙之創造，皆布滿二者之中。今所著書，正如小兒對客指點堂室陳設，使知主人之榮耀耳」。詳見韋廉臣，〈凡例〉，《格物探原》（澳洲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館藏，光緒二年鉛印本），頁 1。

年起他便擴大戰場，開始在傳教士的報刊《教務雜誌》發表文章為自己辯護，強調西學與基督教的相容性。<sup>51</sup>延續先前寫給英國浸信會答辯信函上的論述，李提摩太以「上帝為體、西學為用」的論點來化解推廣科學、科技等西學知識與傳教不見得一致的矛盾。他在〈基督教的歷史證據——當前益處〉（“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Present Benefits”）一文中提到，傳教士有責任向中國傳遞促使其改革的相關知識，包含科學、科技、與社會制度等，而傳遞西學的職責，從基督教本身的教義來看都能找到根據：

電力在過去幾年間的高度發展，較之其他的設備讓人們得到更多的福祉。似乎我們已處在空中航行、化學食物的前夕，然而，中國的一般學校並不教導這些。中國在一般學校中只教導古代的知識，並不研究那些重要問題，例如如何幫助那些越來越多受困於貧窮、飢餓的人民。<sup>52</sup>

<sup>51</sup> 李提摩太從 1890 至 1891 年在《教務雜誌》發表〈基督教的政治益處〉（“Political Benefits of Christianity”）、〈基督教的道德益處〉（“Moral Benefits of Christianity”）、〈基督教的精神益處〉（“The Spiritual Benefits of Christianity”）、〈基督教的歷史證據——當前益處〉（“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Present Benefits”）等文章。從文章的標題即可知，它們是一系列以基督教為本位的論述文字，從歷史的角度分別申論基督教對國家、人民、道德、精神的益處，述說基督教在歷史上的貢獻。這些文章並不是只有發表在西文報刊上，它們同時也以「救世教益」為題發表於中文報刊《中西教會報》及《萬國公報》。〈救世教益〉內容分述基督教（在其文中稱為「救世教」）對於藝、文、政、俗、道、德的益處，說明基督教不僅有益於國家法政，亦有助於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李提摩太在這一系列文章當中刻意使用「救世教」這一名稱，顯然是有意的凸顯基督教的「救世」特質。此外，李提摩太在部分篇章當中使用「救世子」的筆名，藉此表明作者個人的救世情懷。李提摩太，〈續救世教益〉，《萬國公報》，1891 年 3 月，頁 23。

<sup>52</sup> Timothy Richard, “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Present Benefits,”

如同古代先知及我們的主所定義的，基督教會的目的是使罪苦中的萬物得到救贖。先知又說，「知識」是基督天國穩定的基石。因此，最優秀的傳教士，無論年齡及國籍，就算無法引領教育，也會致力於支持知識的普及。他們的目標是教導各國最好的東西，待之如同一家的兄弟，並認識到這是偉大上帝的旨意。如果中國希望再次成為世上最優秀的國家，則必須立即介紹現代教育以適中國之所需。在中國的諸多朋友當中，沒有人比基督教傳教士及其教會更願意協助她了。<sup>53</sup>

根據李提摩太的論述，基督教是為了人類的福祉而存在，傳教士的終極目標是實現上帝的旨意，因此負擔起對中國的教育責任、推廣各種知識不僅不違傳教宗旨，還是必要的手段。西學知識對當時的中國至關重要，中國知識階層也渴望學習，因此必然要列在傳播之列。

這種將傳遞西學知識提高至基督教教義高度的論述模式，可被看成是 1888 年李提摩太回應德治安答辯信件的延續，差別僅在於 1888 年的回信只有少數人知悉，但到了 1891 年李提摩太的論點已經公開化，正式宣告了他將融合西學進行傳教。透過在傳教士報刊上的發文，李提摩太明確地展現了他的傳教觀點，認為科學、科技、與近代文明等知識都應該推廣。有了基督教教義做為基礎，李提摩太所推行的西學傳教工作便有了根據，也使得他所做的工作具備了正當性。

1894 年李提摩太進一步地為其傳教方法進行形而上的論述。該年 1 月他於《教務雜誌》發表一篇題為〈上帝賜福人類的多種方法〉(“God’s Various Methods of Blessing Mankind”)的文章，繼續指出基督徒在人世間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實現上帝的意旨、解除人世間的苦難，而其終極目標

---

*The Chinese Recorder* 22:10 (October 1891): 447.

<sup>53</sup> Timothy Richard, “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Present Benefits,” *The Chinese Recorder* 22:11 (November 1891): 494-495.

就是「建立上帝的在世天國」。該文多次引用《聖經》上的說法來支持其論述：

先知所提供的榮耀篇章提及天國將由彌賽亞所建立。彌賽亞將建立正直的秩序，提供幫助給貧困、受壓迫、寡婦及需要的人。天國充滿和平、正直、救贖與讚美，上帝的旨意於世界各國實現。《新約》當中提到，我們的主將建立在世天國，如果能實現，萬事萬物都屬於天國。

今天，基督教會再度喚醒自己、從過去深沈的睡眠中醒來，面對所有的問題，並吹響號角回應上帝的要求來拯救這個世界，讓世界沒有被遺忘的地方。「他在世上的旨意將被實現，猶如在天上。」上帝統治物質與能量、心智與人格，上帝的子民將在他的規劃中長成。<sup>54</sup>

針對實現上帝在世天國這一目標，李提摩太明確地提出了三種可以實現的方法，<sup>55</sup>其中的一種方法便包括利用近代科學與科技等西學：

接下來，試想「現代」科學的發展與創造。當長期潛伏的強大自然能量從永恆的睡眠中被喚醒用來服侍人們，從白晝到黑夜，從大地到海洋，它都能即時點亮我們的電燈。事實上，它

---

<sup>54</sup> Timothy Richard, "God's Various Methods of Blessing Mankind," *The Chinese Recorder* 25:6 (June 1894): 274-275. 該文後來亦收錄於李提摩太的文章選集《改變百萬中國人的信仰》(*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詳見 Timothy Richard,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Vol. I, 149-165.

<sup>55</sup> 它們分別是「經由發現事物與發明的法則」(by the discovery of the laws of matter and invention)、「經由發現社會生活與立法的法則」(by the discovery of the laws of social life and legislation)、「經由發現神聖與宗教的法則」(by the discovery of the laws of divinity and religion)，這三種方法都可追溯自上帝的旨意。詳參 Timothy Richard, "God's Various Methods of Blessing Mankind," 275.

是我們忠誠的奴僕，就如同我們所著迷的阿拉丁神燈一樣。一方面它向我們展示巨大及無法想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讓我們相信我們是上帝真正的子民，有能力去創造新世界！<sup>56</sup>

李提摩太認為，人類具有發現事物背後原理的能力，進而能創造與發明，近代科學的發展即源生於此。這個能力是上帝所賦予的，人類應當善用此一能力使上帝的天國在人間實現。根據這樣的論點，既然以科學和科技所代表的近代文明屬於上帝的恩典，且此一恩典應當被善用以造福更多的人類，那麼傳教士善用科學、科技等近代文明知識便完全合情合理。在這篇文章當中李提摩太明確地將科學、科技等西學知識作為實現在世天國的「方法」，至此，以實現上帝的在世天國為核心目標，以科學、科技、近代文明等西學知識為工具的論述已然形成。簡而言之，李提摩太為其傳教工作建立起一套「上帝為體、西學為用」的傳教理論。這套理論一方面呼應了當時一般新教傳教士面對西學的態度，另一方面也為其後來在中國的西學推廣工作建立起理論的基礎。

在面對西方文明強勢進入中國的時候，中國學者曾經有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希望以此化解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可能的矛盾，此一主張也成為當時洋務派官員在面對西學時所常提出的觀點。同樣的，在面對基督教內部保守勢力反彈的時候，李提摩太提出「上帝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述，試圖化解其中可能的矛盾，進而合理化自己的傳教工作。李提摩太與洋務派官員張之洞、李鴻章有過多次的合作，張之洞曾參考李提摩太的意見推行改革，李鴻章也曾邀請他赴天津擔任《時報》的編輯，以此向中國推廣西學。<sup>57</sup>洋務派的

---

<sup>56</sup> Timothy Richard, "God's Various Methods of Blessing Mankind," 276.

<sup>57</sup> 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頁 150、195。

觀點與李提摩太的論述在此相互配合、相輔相成。順著中國對西學知識的渴望，李提摩太的西學推廣工作也就因此水到渠成。<sup>58</sup>

## 六、結語

1911 年李提摩太的傳記《李提摩太傳》(*Timothy Richard, D.D.: China Missionary Statesman and Reformer*)出版，<sup>59</sup>1924 年另一本傳記《李提摩太在中國》(*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Seer, Statesman, Missionary & the Most Disinterested Advisor the Chinese Ever Had*)出版。<sup>60</sup>此後，李提摩太給人們的印象基本上就定型了：他除了傳教士的身分之外，更是一位政治參與者及社會改革者，不僅大力推廣西學，甚至還影響了中國的政治改革；相較之下，其做為傳教士的這一身分便較為隱晦。學者研究晚清西學東漸這段歷史時較注重李提摩太做為政治參與者及社會改革者這一面向，使得他做為傳教士的這一面向較被忽略。事實上，若將討論的視角回到傳教士的生命歷程本身，便會發現即使當時的新教傳教士能接受輔以西學的傳教方式，但在實際的傳教工作中，傳教士要傳播西學仍然會遇到許多的挑戰。

身為英國浸信會傳教士的這一身分，使得李提摩太無法像中國知

<sup>58</sup> 李提摩太的西學傳教模式在他進入廣學會之後有了具體落實的機會。廣學會大量出版各種西學相關書籍，《萬國公報》上也不斷刊登與西學有關的文章。從李提摩太正式加入廣學會的 1891 年起一直到戊戌變法後的 1900 年，廣學會不論書籍或是報刊的出版數量都一直增加。詳見王樹槐，〈清季的廣學會〉，頁 215-221。

<sup>59</sup> B. Reeve, *Timothy Richard, D.D.: China Missionary Statesman and Reformer* (London: S.W. Partridge & Co., Ltd., 1911).

<sup>60</sup>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Seer, Statesman, Missionary & the Most Disinterested Advisor the Chinese Ever Had* (London: Seeley, Service & Co., Ltd., 1924).

識分子那樣揮灑自如，在推廣科學、科技等知識的同時大談中國的改革與未來，以傳教士的身分要做與傳教本身沒有直接關聯的工作仍有其困難。李提摩太一方面要向中國知識階層傳播西學，另一方面也得面對教會內部保守勢力的反彈。因此，「上帝為體、西學為用」神學理論的提出便是其應對之道，使得他能在傳教與西學之間取得平衡。以此一神學理論為基礎，李提摩太傳播中國知識分子所關心的西學知識，也讓他成為晚清西學東漸浪潮的主要推手之一。

透過李提摩太這一個案研究可知，在西學東漸浪潮底下並非只有中國知識分子在轉型，參與其中的西學傳播者也在轉型。西學東漸做為晚清中國的一股重要浪潮，參與其中的個體不論是中國知識分子、或是傳教士都在其中有所調整以適應新潮流的轉變。在這一大浪潮底下，流行於中國知識階層間的理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與李提摩太的神學觀點「上帝為體、西學為用」形成巧妙的對比。<sup>61</sup>

(本文於 2019 年 3 月 11 日收稿；2019 年 6 月 4 日通過刊登)

\*本文蒙兩位匿名審查人評閱並提供修改建議，謹此特申謝忱。

---

<sup>61</sup>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念在晚清得到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支持，相比之下，李提摩太「上帝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述在當時並沒有得到基督教內部廣泛的回應，來自教會內的迴響並不多見。此一狀況足見晚清基督教會依然是以傳遞福音為主流，傳教之餘還願意傳播西學的傳教士仍相對屬於少數。李提摩太個人也體認到這個狀況，他在〈中國的危機及如何應對〉(“The Crisis in China, and How to Meet It”)一文中便指出這個情況，詳見 Timothy Richard, “The Crisis in China, and How to Meet It,” *The Chinese Recorder* 29:2 (February 1898): 84.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一) 彙編

- 《聖經(和合本)》，香港：香港聖經公會，1981。
-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著，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 李提摩太，《近事要務》，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及檔案館(The Angus Library and Archive, University of Oxford)館藏，光緒八年鉛印本。
- 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格物探原》，澳洲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館藏，光緒二年鉛印本。
-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73。
-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 Reeve, B. Timothy Richard, D.D.: *China Missionary Statesman and Reformer.* London: S.W. Partridge & Co., Ltd., 1911.
- Richard, Timothy.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Vol. I & II.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07.
- Richard, Timothy.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Publishers, 1916.
- Soothill, William Edward.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Seer, Statesman, Missionary & the Most Disinterested Advisor the Chinese Ever Had.* London: Seeley, Service & Co., Ltd., 1924.

## (二) 檔案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Correspondence, no. CH/1, CH/4, CH/65. The Angus Library and Archive, Regent's Park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 (三) 報刊

《萬國公報》(上海)

《中西教會報》(上海)

Richard, Timothy. "From Rev. Timothy Richard." *The Chinese Recorder* 19:4 (April 1888): 180.

Richard, Timothy. "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Present Benefits." *The Chinese Recorder* 22:10 (October 1891): 443-451.

Richard, Timothy. "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Present Benefits." *The Chinese Recorder* 22:11 (November 1891): 491-498.

Richard, Timothy. "God's Various Methods of Blessing Mankind." *The Chinese Recorder* 25:6 (June 1894): 272-282.

Richard, Timothy. "The Crisis in China, and How to Meet It." *The Chinese Recorder* 29:2 (February 1898): 78-86.

## 二、近人論著

王樹槐，〈清季的廣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臺北，1973)，頁193-227。

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雙月刊》，52(香港，1999.4)，頁29-39。

陶飛亞，〈傳教運動的圈內「聲音」——*The Chinese Recorder*(1876-1941)初論〉，收入張先清編，《史料與視界—中文文獻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

- 出版社，2007，頁 243-262。
- 葛兆光，〈西洋新知的進入——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世界的變遷〉，收入葛兆光，  
《中國思想史——七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頁 393-420。
- 鄒振環，〈李提摩太與《泰西新史攬要》——「世紀史」的新內容與新形式〉，收入鄒振環，  
《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 1815 至 1900 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269-307。
- 熊月之，〈李提摩太——「鬼子大人」〉，收入熊月之，  
《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466-489。
- 劉雅軍，〈李提摩太與《泰西新史攬要》的譯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7：6(石家莊，2004.11)，頁 119-124。
-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16：3(臺北，2005.9)，頁 137-170。
- Bennett, Adrian A.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Bennett, Adrian A.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3.
- Chang, Hao. "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8."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1: Late Ch'ing, 1800-1911.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274-3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Cohen, Paul A. "Missionary Approaches: Hudson Taylor and Timothy Richard." *Papers on China* 11 (December 1957): 29-62.
- Cohen, Paul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Elman, Benjamin A.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Johnson, Eunice V.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1880-1910: Timothy Richard and His Vi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2001.
- Johnson, Eunice V. *Timothy Richard's Vision: Educ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 1880-1910*. Eugene,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4.
- Johnson, Rita Therese. "Timothy Richard's The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to the Non-Christian

- World.” Ph.D. Dissertation, St. John’s University, 1966.
- Kaiser, Andrew Terry. “Encountering China: The Evolution of Timothy Richard’s Missionary Thought (1870-1891).”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015.
- Lai, Pan-chiu. “Timothy Richard’s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29 (2009): 23-38.
- Lian, Xi. *The Conversion of Missionaries: 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07-1932*.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7.
- Lindberg, David C. and Ronald L. Numbers. “Introduction.” In *God and Nature: Historical Essays on the Encounter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Edited by David C. Lindberg and Ronald L. Numbers, 1-18.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Ng, Peter Tze Ming. “Timothy Richard: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s Other Religions and Cultures.”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14:1 (2008): 73-92.
- Zetzsche, Jost Oliver.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2: 1800-Present*. Edited by Gary Tiedemann, 175-192. Leiden, Boston: Brill Publishers, 2010.

## **God as the Essence, Western Learning as Practical Use: The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to the Missionary Timothy Richard's Promo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Chih-wen Kuo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Heidelberg University.

Chinese intellectuals faced the task of transformation when Western learning was imported into China in the late Qing. At the same time, missionaries promoting Western learning in China faced a similar task. Both knowledge providers and receivers met challenges in this transformation period. In the past, scholar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Chinese intellectuals, studying their responses to Western learni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issionary, Timothy Richard, who was famous for promoting Western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Baptist missionaries and their church,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in London, is studied in this research. Their correspondence is currently held in the Angus Library and Archive, Regent's Park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The present research studies Richard's experience of balancing Christianity and Western learning on the basis of his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Richard's theological view, "God as the essence, Western learning as practical use," coincidentally corresponded to the notion of "Chinese learning should be the core, and Western learning

should be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which was proposed by many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Qing.

**Keywords:** Timothy Richard, The B.M.S. correspondence, Christianity and Western learning, Western learning imported into China